

中国东南

土著民族

历史与文化的

考古学观察

吴春明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WUCHUNMINGZH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吴春明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7
ISBN 7-5615-1521-9

I. 中… II. 吴… III. ①民族历史-考古-中国-东南地区②民族文化-考古-中国-东南地区 IV. K8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934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福建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沙县府西路 87 号 邮编:365500)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

字数:486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1999.12.2

考古书店

序

地处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在我国自然地理体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区。自古以来,生活在该区域内的居民及其创造的文化即有着鲜明的特点。研究这些特点,揭示其发展规律及融入中华统一文化的过程,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民族精神,共同创造新的灿烂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很早就有关于东南地区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的记述,但大都简略而零散,难成系统。现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相继兴起并传入我国之后,以林惠祥为代表的一些受到西方新思想、新学科影响的有志之士,曾做过不少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调查,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论文,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陆续展开,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遗址,填补了不少空白。1977年、1978年分别在南京、庐山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学术讨论会”和“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对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及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做了初步总结。肯定了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明确了以后应该努力的方向,从考古学上将东南地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尚极少见。

当大家正在回溯本世纪各学科走过的历程,展望21世纪学科发展前景的时候,我十分欣喜地看到了厦门大学吴春明同志的大作《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文稿。由于没有完整的时间,仅断断续续地读过一遍,许多问题尚未来得及细细品评领会,但作为一个对东南地区考古一直怀有浓厚兴趣,比较熟悉它的研究历史,并自视还有一定研究心得的考古工作者,我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这部书对20世纪东南地区考古做了历史性的总结,它的出版标志着东南地区考古翻开了新的一章,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我认为这部书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是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它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梳理了古代文献中对东南地区土著民族历史、文化的记述;从自然地理学角度阐述了东南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对形成当地居民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内涵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考古学角度对考古遗存系统地进行了分期和分区研究,构建了当地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角度探讨了其民族特性、文化特质及其相互关系。由于他的研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因而它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东南地区特定地理区划内,从旧石器时代直至晚近,当地民族及其历史、文化发展清晰的有血有肉的丰满的全景画卷。

第二,是研究内容的开放性。它立足于东南地区,又不局限于东南地区,而是以东南地区为核心,联系其背倚的周邻和中原腹地及面对的海洋岛屿,搭建起了一个大范围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网络体系。读者通过这部书,既能看到东南地区内部多样而一体的文化格局,又能看到东南地区与周邻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从而加深对东南地区自身历史文化的认识。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严密性。作为一部综合研究的学术著作,它是以大量个案专题研究为基础的,它的完成贯穿了学术研究从个案到综合的规律,是个案研究成果汇于一炉的结晶,因而其立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绝不像时下充斥书肆靠剪刀加糍糊攒出来的内容贫乏且错误百出的所谓“专

著”。

春明是我的老朋友吴绵吉教授的高足，才华横溢，勤奋执著，在考古学、民族学领域做出了不少成绩，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过去，我读他发表在《考古学报》、《东南考古研究》等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有欲罢不能的感觉，今日再读他的大作，更是心潮起伏，兴奋不已。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预祝东南地区考古研究再攀新的高峰。

是为序。

李伯谦

1999年4月25日

目 录

序	李伯谦
---------	-----

上篇 考古学上的东南土著民族历史

第一章 绪论：自然、历史与人文视野中的“东南”	(3)
1 自然与人文意义上的“东南”	(4)
2 汉文史籍中东南土著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9)
第二章 起源论：从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文化看东南原住民的产生	(15)
3 东南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分类编年	(16)
4 东南化石人类区域演化序列与蒙古人种南部类型的出现	(32)
5 东南砾石石器工业的源流与旧石器文化的演变	(41)
第三章 空间论：从印纹陶文化的总谱系看土著民族的地域关系	(62)
6 分地带、多区系而一体——重建东南印纹陶文化总谱系的尝试	(63)
7 背倚华夏、面向南岛——关于东南土著民族的周邻关系	(74)
第四章 变迁论：从印纹陶文化的若干序列看土著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82)
8 赣鄱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	(83)
9 从闽江流域印纹陶文化的源流看福建土著民族的历史	(97)
10 晋江、九龙江与韩江流域早期古文化的初步序列	(118)
11 台湾西海岸史前文化进程的初步分析	(128)

下篇 考古学上的东南土著社会与文化

第五章 社会论：从中国文明到东南社会的文化相对论思考	(139)
12 关于“文明”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140)
13 东南沿海的先秦文化与早期文明	(158)

第六章 文化论:东南土著特殊人文的比较考古学个案	(171)
14 东南土著考古人文特殊性的再思考.....	(172)
15 印纹陶文化体系中的“几何形纹彩陶”.....	(184)
16 “珠贝”民族中的“玉器”文化——说福建先秦玉器.....	(196)
17 汉化中的“越王城”和越化中的楚汉墓.....	(204)
18 东亚南部崖葬文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	(213)
第七章 残余论:土著文化残留的民族考古学拾零	(236)
19 台湾高山族的原始制陶文化及其民族史意义.....	(237)
20 福建惠东特殊人文不是土著越人的母权文化“残余”.....	(244)

附篇 东南考古理论与方法

第八章 方法论:从考古学一般方法到中国东南研究	(257)
21 说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在考古学中的运用.....	(258)
22 “西学东渐”中的近代考古学.....	(265)
23 林惠祥与“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考古.....	(274)
后记.....	(280)

上 篇

考古学上的东南土著民族历史

第一章 绪论

自然、历史与人文视野中的“东南”

人类的起源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作用，文化的生态史观是现阶段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我国，自史前至历史早期的民族文化千姿百态，谱系繁复而又统一。形成这种统一而又多样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自然地理统一体中不同层次的分域结构。

我国的东南是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地理范围包括以长江下游的鄱阳湖、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平原与盆地地带，钱塘江、瓯江、闽江、九龙江、韩江、珠江等诸河流域所在的沿海丘陵与山地地带，及毗连的台湾等岛屿，即今行政区划上的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上海、台湾、海南，及苏、皖等省的南部。

东南地区既是统一而多区划的我国自然地理体系中相对独立的分域，更是早期人文、历史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特殊环节。东南地理的特殊性体现在与早期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地貌、土壤、气候、动植物种群等生态因素上，这一分域特点自更新世以来就已经基本定型，成为史前至历史时期南方民族文化相对独立于中原华夏之外的重要背景。在我国历史早期，“东南曰扬州”。东南土著民族文化经过了若干阶段性变迁，反映在汉文史籍中即传说时代的“三苗”、商周时期的“七闽”和“八蛮”、东周秦汉时期的“百越”民族、汉末六朝“遁逃山谷”的“山越”与“溪峒”，从此东南历史才真正纳入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统一体中。

1 自然与人文意义上的“东南”

作为我国自然地理区划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域，东南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状况就是这里的早期土著人文内涵发育与发展的深刻的自然历史根源。

一、中国自然地理区划中的“南方”

我国大陆本土地处欧亚板块东部、太平洋西岸，四界基本上均有大山、荒漠、海洋与周边地区相对隔离，形成统一、独立的自然地理基础。同时，各地生态环境又表现出复杂的分域特点，东西之差、南北之异形成了多层次的自然区划体系。^[1]

东部季风区和西部内陆区是我国自然地理的两个最基本区划。东部季风区即通常所说的“东部”，从东北到岭南，平原、盆地、丘陵、低山相间，受到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季节性影响，气候湿润，森林植被发育，适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是古今人文繁荣的主要区域。在这里，纬度差导致南北分域差异，为各民族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不同的适应机制。特别是从华北到华南这一我国史前文化繁荣发展、农耕文化最早发生、国家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分别以长江干流和黄河干流为中心，形成北方、南方两个主要分域。其中“北方”自然区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就是传说时代三大部落集团中炎黄、东夷文化的活动地区，“南方”自然区所在的长江干流及其以南大致相当于苗蛮集团活动区。

在地貌上，南方地区以山地、丘陵、盆地、河网和湖泊相间为特点。这里是我国地表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广布酸性红壤，适合水稻、柑橘、香蕉、荔枝、龙眼、橡胶、咖啡、茶叶等作物生长。而北方地区则以大面积的平原和高原为主，地表水不足，广布碱性黄土和次生黄土，适于小麦、荞麦、玉米、高粱、谷子、油菜、芝麻、棉花等作物生长。

湿热的亚热带、热带气候是造成南方自然生态特点的主要原因。由于纬度低且濒临东海、南海，南方年平均气温在 $16\sim 25^{\circ}\text{C}$ 之间，热量丰富，全年 10°C 以上积温为 $4500\sim 10000^{\circ}\text{C}$ 以上，降水量最为丰富，年降雨量 $1000\sim 2200$ 毫米。而北方地区因纬度高，各种气候因素指数明显低于南方，年均温仅 $8\sim 13^{\circ}\text{C}$ ，热量尚足，全年 10°C 以上积温为 $3200\sim 4500^{\circ}\text{C}$ ，季节差别大，冬季寒冷，夏季炎热，降水不足，全年仅为 $600\sim 800$ 毫米。

南方植被以常绿阔叶林和热带季雨林为特点，类型复杂多样，总量丰富。因受地貌、土壤、湿热的气候环境影响，从江淮到岭南由若干渐变的地带性植被群落组成，即江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江南常绿阔叶林，华南沿海季雨林和雨林。在整个南方植被体系中，北部多我国特有的树种，往南多亚洲，特别是热带亚洲、大洋洲成分。与南方这些个地带性常绿林植被景观显著不同，华北地区以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为特点。

在植被群落格局的直接影响下，南、北方动物种群资源也明显不同。南方地区是适应常绿林和季雨林的“东洋界”森林、灌丛、草地、农田动物群，构成复杂，季节性生态现象不明显。华北地区则是

适应针、阔混交的‘古北界’森林—森林草原、农田动物群,有明显的冬眠、暖季繁殖、数量优势、换毛等季节性生态规律。

可见,在地貌、土壤、气候、动植物种群等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因素上,长江干流以南的“南方”和以黄河干流流域为中心的“北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量地质、考古资料证明,虽然自更新世以来发生过一系列的气候波动,引起全球性的自然生态变化,但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格局,特别是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区域性生态差异是早已定型的。这一点最鲜明地表现在动、植物种群地理的南、北格局上,现代南方‘东洋界’动物群就是更新世时期华南的‘巨猿、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延续,而北方的“古北界”动物群也可以在更新世华北“泥河湾—北京人—萨拉乌苏动物群”找到渊源;在气候与植被地理上,虽然冰期期间曾使气候带向南移动 3~5 个纬度,但至少自更新世晚期开始,秦岭—淮河一线已经成为我国南、北方气候与植被的分水岭。这种起于远古时代的自然生态南、北差异,应就是史前至历史早期我国南方“苗蛮集团”民族不同于并长期相对独立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重要原因(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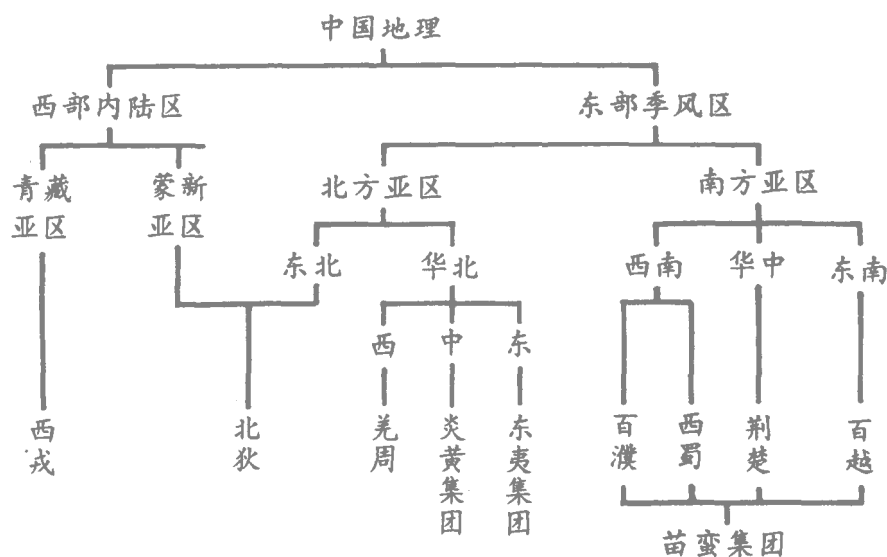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自然地理区系与人文谱系位置关系

二、南方地理中的‘西’‘中’‘东’之异

在以复杂、多样为特点的‘南方’生态中,纬度、地势、海陆位置差别还造成了进一步的自然地理差异,其中地势、海陆位置差别所造成的自西向东的分域格局尤为突出。

南方地理中的东西分域的主要界限在川鄂、湘黔省界一带的巫山、雪峰山一线,形成三个地理分区。该线以东广阔的大东南区域内,分别形成长江中游所在的“华中”和长江下游以南沿海所在的“东南”两个地理分区。该线以西为长江上游和西江上游流域所在的‘西南’区。南方自然地理的这种西、中、东差异表现在:(1)地貌上,华中和东南区域的丘陵、低山、平原相间的地貌组合处于我国三级地势结构的第三阶梯上,西南区域的高原、盆地相间的地貌组合处于第二阶梯上。(2)海陆位置与

气候上,东南地区受海洋影响强烈,气候最温暖,雨量最充沛;西南地区地势高且受海洋影响较小,较之中部、东南部同纬地区气候的大陆性倾向加强,高原山地空气干燥,均温和积温都较低,且季节差别大。(3)受地貌与气候的制约,东、西间的物种资源差别也很大,西部植被受海拔高低影响而垂直变化明显,除热带、亚热带的常绿林外,混交较多半绿、落叶、针叶、藤刺、灌丛、山地草坡等喜凉植被;东部植被则相反,垂直差别小,热带、亚热带种群比较整齐,是我国野生动植物种群的多度和丰度最高的区域。由于南方自然地理中西部与中、东部之间明显的生态差别,有些自然区划方案也将西南地区从南方亚区中划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亚区看待。〔2〕

南方地区的西、中、东分域,正与我国古代苗蛮集团不同支系的活动区域相吻合。西南地区是巴蜀、百濮、西南夷的活动畛域,华中地区是荆楚民族的地带,东南地区则是百越及其先民的生存地。

汉文史籍从很早起就关注南方、东南生态特殊性对人文的影响。《后汉书·南蛮列传》载传说时代的南方地区“所处绝险,人迹不至”;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描述的就是湿热的东南山地丘陵环境的特殊性。《尚书·禹贡》扬州“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也是上古东南热带、亚热带风土物产的写照。《周礼·职方氏》载东南“其畜宜鸟兽 其谷宜稻”。《吴越春秋·阖闾传》所记“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所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说的都是东南生态地理与北方中原的巨大差异。

三、“东南”地理内部的条状分域

在长江下游以南的东南地理内部,因南北间纬度差、地貌分布格局以及海陆位置的不同,又形成了区域内部规律性的自然生态差异,集中表现为大致北东—南西向的若干条块分域上。

首先,具有深刻的地质构造背景的主要地貌单元的规律性分布,形成了自然地理条状分域的主要基础。东南区的平原、丘陵、山地等基本上都按北东—南西方向排列,这源于二列基本平行的地质隆起带和二个拗陷带,就是武夷—南岭为主干的东南沿海山地和包括台湾在内的环西北太平洋岛弧二个构造隆起带,它们自新生代以来基本处于不断隆起状态。其间相对的是包括赣鄱平原—长江三角洲在内的长江中下游拗陷带,和包括浙—闽—粤沿海及相连的东海—台湾海峡在内的东南沿海平原、陆缘海域拗陷带。这基本平行的两列隆起和两列凹陷形成东南陆区地形、地貌的三列小分域,即内列的长江下游平原、江河湖网与盆地,中列的东南山地与沿海丘陵,外列的台湾、海南等沿海岛区。地形、地貌上的这种分布格局直接影响到河流走势,形成东南水系分布的三大体系,即赣鄱、太湖等长江下游水系,钱塘江、甌江、闽江、九龙江、韩江、珠江等东南沿海诸河流域,海南、台湾等岛屿水系。

其次,因纬度差别,造成区域气候的南北变化,从长江下游平原至海南岛依次为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边缘热带气候。同时还很大程度上受前述地貌分布格局和海陆位置的影响,东部沿海近岸地带受海洋季风的强烈影响,气温、降水等主要气候因素明显高、大于西部离岸内陆,特别是武夷—南岭隆起带两侧地区的气候差别更明显,使得东南区气候带沿海一侧明显北移,离岸内陆一侧明显南移,造成气候区划北东—南西的条状块,与前述东南平原、丘陵、山地等地貌因素分布及河流、水系格局大体重合,呈现出大致同向的三列平行地带。内列是包括鄱阳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在内的平原、盆地地区,属于北亚热带,10℃以上积温 2500~4800℃,降水量 1000 毫米以上,东部三角洲可达 1500 毫米,植被以常绿和落叶混交的阔叶林为特点。中列是东南沿海山地、丘陵地区,属于中、南亚热带,10℃ 以上积温可达 6400~8000℃,降水量 1600~2000 毫米,以常绿阔叶林为特点。外列是沿海平原、岛屿地区,属边缘热带、中热带, 10℃ 以上积温达 8000~10000℃,降水量达

1400~2400 毫米,以热带季雨林为特点。

这种大致呈北东—南西方向的条状分域格局,造就了东南区内部自然地理的两种不同的倾向性差异,即与海洋环境直接相连的沿海山地、丘陵及相间小平地地带,和与内陆腹地环境直接相连的江南平原、盆地地带。

总之,在我国这个自然地理大单元中,东西之别、南北差异构成了多层次的自然生态区划体系,这是经过了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形成的。其中,分别以黄河干流和长江干流为中心的“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综合生态差异,更是始终伴随着华夏(炎黄—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长期共存、相对独立并各自创造着不同民族文化体系的全过程。东南地区是一个生态环境非常独特的南方分域,在我国早期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谱系结构中,居于东南的百越及其先民创造了内涵独特、传统深厚、支系繁多的民族文化,也同样与东南区域内部自然地理的条块分区密切相关。

四、历史人文意义上的‘扬州’与‘东南’

人文地理上的“东南”概念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华夏文明中心思想。从传说时代以来,在我国人文关系史上逐步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心及外围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样一个粗放的民族分布格局的认识。位于中央的华夏即“中国”,即九州中的冀州、豫州、兖州等,位于长江下游以南的我国东南地区为扬州,《周礼·职方氏》语“东南曰扬州”。

华夏对中国以外四邻人文关系的认识是逐步由“中央”向外推进的,对东南民族、地理的认识也由北向南经历了一段过程。所以早期人文中的“东南”“扬州”域所指并不同一。最初的“东南”界域只是靠近中原的东南亚部,后来才扩展到东南全境。^[3]

夏商时期,东南“扬州”仅仅包括江淮间的狭小地域。《尚书·禹贡》载:“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涂珉、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邵望平也说,《禹贡》“九州”风土仅与考古发掘所见“周汉寒冷期到来之前,即公元前第 2000 年间中华两河流域人文地理”相符,就是说夏商时期华夏的人文地理知识仅限于黄河、长江的干流流域。^[4]那么,夏商时“扬州”就只是靠近中原中心的东南亚部地带。正如顾颉刚在《禹贡注释》里所说:“在禹贡里,东南方只到震泽(今太湖)”;从淮水以南直到东海,跨今苏皖两省的南部以及江西省的东部、河南和湖北的东边一角,唤作扬州”。

随着华夏的人文地理知识向周边地区的不断扩展,九州的畛域才逐步扩大,约周代开始“扬州”才是指东南全境。“东南”之称始见于《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可见,周初的“扬州”已越过江淮,包括有“八蛮、七闽”等东南人文。

《吕氏春秋》曰:“东南为扬州,越也”;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说明战国以来“东南”“扬州”“百越地区”所指已是同一空间位置,相当于今东南全境。

所以,后世学者考《禹贡》“扬州”地理,说“北距淮,缘边与徐、豫界,西缘义阳以东连山,至湖北黄州,包江西与荆为界,南跨岭南,全制交、广,以海为界,东滨海。”与今东南地理约同。^[5]这只是两周以来才形成的人文区划格局。

注释:

-
- [1] 冯绳武主编:《中国自然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2] 高等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自然地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
- [3]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中国东南 早期历史与考古文化》,《东南考古研究》第 1 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4]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集》第 2 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 [5] 汪士铎:《〈禹贡〉扬州疆域考》,见《汪梅村先生集》卷 2,转引自贺云翱:《历史上“东南”地域考》,见《历史与文化》,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6 年版。

2 汉文史籍中东南土著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虽然东南早期土著具有本民族自身特殊的语言文字,民族史学者也希望从东南考古文物中探寻东南民族文字的踪迹,但迄今还远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只能说,现有认识中的东南土著还是缺乏本民族自身文献历史的“史前”民族。

商周以来,随着中原华夏政治与文化向周边地区,包括东南地区的逐步扩展,华夏民族对周边人文的认识逐步加强,并不同程度地予以记述,东南土著的历史文化也开始零星地出现于《尚书》、《周礼》的一些段落中。秦汉以来,随着汉民族向东南地区的扩张和融合步伐的加快,汉文史籍中对东南民族的记述更加详细,出现了《史记》中的吴、越“世家”和东、南越“列传”等系统篇章。在研究东南土著民族的历史文化时,这些站在“异文化”角度上的“民族志”式的汉文史籍,仍是目前主要的“文献”依据。

汉文史籍告诉我们,先秦东南土著民族文化的发展非常复杂。大致可以这样说,传说时代是苗蛮集团的东支——“三苗”,商周时期是诸“蛮”,东周以后出现“百越”。

一、传说时代以来南蛮集团中的“三苗”

在中国文明初期,华夏向四邻扩展与融合的节奏相当缓慢,《尚书·禹贡》所示九州疆域中,直到夏商时期仍主要限于黄河、长江中下游之间的平原一带。由于早期华夏对南蛮的知识受地理限制,出现于汉文史籍中的南蛮支系也仅限于靠近华夏的南方北部一些部族。

史籍中东南最早的民族是传说时代至夏代的“三苗”。《帝王世纪》载“帝尧时‘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淮南子·坠形训》载“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獯鬻国民,裸国民,三苗民……’从排列顺序看,结胸民、羽民是西南民族,大致是《华阳国志·南中志》西南地区的“哀牢夷,皆穿胸”和铜鼓图像上的“羽人”。獯鬻、裸国民约为华中山地民,《尚书·尧典》、《孟子·万章》有“放獯鬻于崇山”语,徐旭生先生指出这是舜、禹南征三苗时,獯鬻居于两湖西部山地的情形;俞伟超先生考崇山在临澧县和澧县以西山地,并推为先楚文化。^[1]这样,三苗则无疑就是东南的原始民族。

《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但三苗并没有被舜悉数西迁,禹时仍强大于东南。《战国策·魏策》载“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彭蠡即鄱阳湖一带,衡山在江北某处而非今湖南衡山,文山尚不可定,但可明确禹时三苗的活动区域东西仍在鄱阳、洞庭两湖之间。就是说,三苗大致活动于东南地区的西北一角。

这样,“三苗”即可追述为汉文献中东南地区最早的先民。当然,三苗并非先王时期东南先民的全部,只是因三苗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地区的西北一角,最靠近中土、最早与华夏文化接触才率先出现于汉文史籍的。所以不能否认那时彭蠡以东、以南的沿海丘陵山地的文化存在,只是因为那些地处天涯海角的原始文化远离中土,在传说时代还罕为华夏所认知。但到了商周时期,情形有了很大改变。

二、商周时期的‘七闽’与‘八蛮’

商周时期,随着南北间政治、军事与文化关系的发展,华夏对东南人文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拓展。代之之前仅有的‘三苗’,汉文史籍中‘新增’了‘十蛮’、‘越沔’、‘七闽’、‘八蛮’等东南民族成分。这些‘新’成员,实际上都是东南固有土著,只是在‘三苗’时代末为华夏所知。

商代,华夏对东南民族的认识有明显的进展,不再限于先前小范围的“三苗”。《逸周书·王会解》:“伊尹朝献商书,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沔深、九夷、十蛮、越沔……正南瓠、邓、桂国、产里、百濮、九菌……’东部的‘越沔’为汉文献中明确出现的最早以‘越’称谓的民族,应是江浙吴、越文化的先民;‘十蛮’也是当时东南的土著民南面的‘瓠’推测即是后来岭南‘西瓠、骆越’的先民。

周代,汉文史籍中的东南民族更多了,区分更明确,地域范围更大。《周礼·象胥》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周礼·职方氏》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国,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虽然四、八、七、九、五、六并非确数,但却说明华夏对外围民族知识的进一步深化。从七闽后裔的闽越族的分布与活动区域看,《周礼》“七闽”应主要指分布于福建一带的周代土著;‘八蛮’约相当于‘七闽’以外的东南,以至南方土著。《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粤无镞,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也。”《逸周书·王会解》载:“东越海蛤,瓠人蟬蛇。”《山海经·海内东经》载:“瓠居海中,闽在海中。”说明粤、吴、越、瓠、闽是大致共存于东南的民族,他们也都应该是周代以来开始为华夏所认识的东南土著。

可见,商周以来汉文献中的东南民族‘增加’了,从先王时代的‘三’苗增至‘七’闽‘八’蛮。徐旭生考苗、蛮二声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可知夏时的‘三苗’到商周时的‘十(八)蛮’,是华夏对东南人文地理知识扩大的结果。商周以来,东南民族间的区分更加明确,超越笼统的三苗而有闽、吴、越、粤、沔、瓠等具体的支系;地域扩大了,不仅限于靠近中土的彭蠡一带,而几乎扩展到东南全境。

三、东周秦汉时期的“百越”民族

战国秦汉时期,先前活动于东南地区的土著诸蛮吴、越沔、瓠粤、闽等逐渐从汉文献中‘消失’,代之而为‘于越’、‘闽越’、‘东瓠(越)’、‘南越’、‘西瓠与骆越’、‘干越’、‘扬越’等不同支系的‘百越’民族。‘百’越族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史记》等战国以来文献。如《吕氏春秋·恃君览篇》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2]《史记》沿用,如《秦始皇本纪》有‘及到秦王……南取百越之地’。

“于越”又称“越”,就是商代‘越沔’的后裔。《春秋左传集解》“定公五年”语‘于越入吴’,杜预解“于,发声也”。《国语·鲁语下》载:“吴伐越,坠会稽。”说明于越是浙江北部的百越支系。

“闽越”、‘东瓠(越)’合称‘东越’,是福建、浙南间的百越支系。《史记·东越列传》载:“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瓠,世号为东瓠王。”

“南越”、‘西瓠与骆越’是岭南地区的越人支系。《史记·南越列传》载:“秦已破灭,佗即击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瓠、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南越’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瓠骆裸国亦称王”。

“干越”是居于江西的百越一支。《荀子·劝学篇》语:“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生,长而异俗。”《史记·货殖列传》载:“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太平御览·州郡部》引韦昭汉书

注：“干越，今余干县之别名。”有人便据此说干越是以江西余干为中心的越族支系。^[3]

还有“扬越”者，《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战国策·秦策》：“吴起为楚悼王罢无能，废无用……南攻扬越，北并陈蔡。”有人认为这支扬越人活动于湘、鄂、赣交界一带。^[4]

从商周时期的“吴”“越”“粤”“瓯”“闽”等诸蛮文化，到战国以来的“于越”“扬越”“干越”“东瓯”“南越”“西瓯骆越”等百越，民族称谓上的这一规律性变化，透露着东南早期土著民族文化变迁过程的重要讯息。“越”本是商周时期居于江浙一带的“蛮”族支系，而战国以来东南土著民族都成为“越”的支系，这说明周秦间发生了因江浙“越”的迁徙并与各地原住诸蛮的融合、生成“百越”民族的历史事件。商周以前的诸蛮文化发展水平不一，其中吴、越民族的文化成就最高，至少在周代已有吴、越王国的建立，这就决定了在东南诸蛮内部的文化互动中，吴越民族处于优势地位，形成江浙的吴越文化向东南其它地区扩展的原动力。文献中多有先秦“越族”向南散迁的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楚威王灭无强，无强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越人“滨于江南海上”“走南山”，就包括了江浙以南广阔的东南地区。这里只是说越国灭亡之后，于越臣民大量南迁的事件。实际上，由于吴、越的相继称霸和相互间的战乱，此前吴、越民族南来迁徙东南的历史也是不难推断的。越族的迁徙及其与诸蛮的融合生成“百越”，在百越的族称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如原住福建的“七闽”与南来“越”族的融合生成“闽越”，浙南“瓯”与“越”融合生成“东瓯（越）”，及南越、骆越、干越等。

四、汉末六朝以来的“山越”与“溪峒”

秦汉以来，中央王朝相继在百越故地推行郡县制度，并对百越民族采取内迁、同化政策。《史记·东越列传》载：建元三年，将东瓯“举国徙中国，乃悉众来处江淮间”元封元年，又将闽越“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秦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和民族迁徙融合了百越民族的大部分。但尚有部分越人逃避山里，成为东汉六朝以来活跃的“山越”。《宋书·州郡志》：“汉武帝世，东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

在唐宋文献中这部分人被称为“溪峒”“峒僚”，就是现今的畲、瑶、黎等少数民族。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畬》载：“然炎昭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苑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畬、曰黎、曰蛋，在漳曰畬。”梁绍猷《南海县志》卷三十五“杂录”载：“岭表溪峒之民，号峒僚，古称山越。”《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也说：“峒僚，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明谢肇制《五杂俎》说：“吾闽山中有一种畬人，相传盘瓠种也，有盘、雷、蓝三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

五、东南早期土著民族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东南早期土著民族文化是一个统一而多样的整体。土著民族文化的统一性，不但体现在一系列既不同于中原华夏，又与南蛮民族的其他支系文化有别文化特质和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上，还体现在从三苗氏到百越间的内在源流关系上。周秦间，随着越文化的传播融合、百越文化的生成，东南民族的统一性更得到了加强。但是，支系繁多与发展过程中多样变迁同样是东南土著民族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传说时代的三苗、商周时期的诸蛮、战国秦汉的百越、汉末唐宋的山越与溪峒，既是东南民族发展阶段性的表现，更是土著民族文化内涵变迁、融合历史的反映。从这一点上说，将东南土著